

谈 维 主 编

校对业务教程

辽海出版社

辽海
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晓晶
装帧设计：子木
 韩力
 王艾

ISBN 7-80649-609-2/G · 181

定价：18.00 元

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桂晓风

顾 问：王 益 卢玉忆 袁 亮 宋镇铃

副组长：陆本瑞 王耀先 尤广巽 于金兰

成 员：阙道隆 庞家驹 袁继萼 石家金

秘 书：柏 楠

编辑专业高等教材编审委员会名单

主 任：阙道隆

委 员：王振铎 司有和 向新阳 吴道弘
杨 耶 李 苓 宋原放 庞家驹
袁继萼 高 斯 徐柏容 黄 卉

出版专业高等教材编审委员会名单

主 任：王耀先

委 员：王仿子 毛 鹏 巢 峰 吉少甫
肖东发 张 敏 周 谊 赵 航
聂玉海 徐有富 徐召勳 孙传耀
柏 楠

序 言

新闻出版署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主持编写的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材，现在陆续与读者见面了。这套教材的问世与使用，对于进一步巩固高等学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建设，以及推动出版教学质量的提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出版工作是宣传思想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1995年1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要切实重视宣传思想队伍的建设，不断提高这支队伍的政治业务水平，努力培养一批全面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贯中西、联系实际的理论家，一批坚持正确方向、深入反映生活、受到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一批熟悉方针政策、社会责任感强、精通业务知识的出版家，一批紧跟时代步伐、热爱祖国和人民、艺术水平精湛的作家、艺术家。不言而喻，这给出版教育和培训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把出版业办成出色的行业，使出版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任务，自然需要把立足点转移到出版业从业人员的教育上面来。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迅猛发展，编辑和经营管理人员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上都存在着很不适应的问题，这就使得这项教育任务更为紧迫。正是鉴于这种紧迫性，80年代以来，出版管理部门加

强了出版教育的规划和部署。把出版教育纳入国家正规的高等教育的范畴之内，是这一规划和部署的重要环节。今天回过头来看，在高等院校设置编辑出版专业似乎理所当然。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有些人否认编辑出版业具有学科体系，甚至否认编辑出版业有学。但在出版界和教育界双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编辑出版专业终于在高等院校站稳了脚跟，并在十多年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套教材的出版可算是它的一项新的成果。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已经在高等学校设置了编辑出版专业或开设专业课程，有的还设立了出版或印刷学院。这种情况说明，编辑出版业的正规教育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了解这一情况，我想对于我们继续办好编辑出版专业是会有所裨益的。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教育目标自然同样适合于出版教育。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对于出版从业人员来说，“四有”标准的要求应当更为严格。据有些调查材料反映，80年代以来，编辑出版队伍，尽管在文化结构层次上有所提高，但思想和业务素质仍然难以适应出版事业发展的要求。从这一现实状况出发，尽管出版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行业，需要重视对于从业人员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以及新兴科学知识的再教育。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开拓新局面。同时不能放松思想道德和编辑出版专业知识的教育。一些地区和出版单位由于抓紧了对于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知识和编辑出版专业知识的全面性的教育要求，在培育人才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他们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当然，由于出版教育还处在初创阶段，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整体说来，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期望在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和帮助下，在全体编辑出版工作者

的共同努力下，出版教育将日益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逐步形成结构健全、正规教育与岗位培训并重的较为完善的出版教育体制。至于这套高等教材，我希望随着编辑出版专业学科设置的逐步齐全，继续按照规划抓紧编写，以期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编辑出版教材系列。已经编印的教材，在使用过程中，当集思广益，及时修订。经过多年努力，如果能够保留一批常备教材，那就是出版教材建设的一个重大收获了。

于友先
1995.4.10.

出版前言

随着我国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特别自高等学校设置编辑出版专业以来，不仅对编辑、出版学科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办学过程中迫切需要有一批系统、全面、准确地总结和反映我国编辑出版工作规律、具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和自己特色的教材。为了克服教材的脱节和滞后现象，使教材工作能同编辑出版专业建设同步发展，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于1989年5月成立了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同年8月在烟台召开编辑出版类高等教材规划座谈会，制订了《关于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材编写出版规划初步方案》。在这次会后，相应成立了编辑和出版两个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1990年5月和1991年4月，又先后在杭州、洛阳召开编审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了两个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条例以及教材编写的质量和体例要求。此外，还讨论了《书籍编辑学概论》、《期刊编辑学概论》等十多本教材的编写提纲，落实了编写出版的具体规划。此后，编辑出版专业教材的编写工作陆续展开。这套教材是新闻出版署教材建设中的重点项目，已于1992年列入国家教委高等专业教材的“八五”规划。

教材的编写应该根据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对各门课程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大体有个统一的要求，以

便更好地实现培养目标。尽管我们几所高等学校的编辑出版专业起步较晚，目前尚无统一的教学计划和大纲，学科的建设也还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但教材的编写，仍要尽量结合有关高等学校设置的编辑出版专业所确定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努力做到既有科学性，又有适教性。为此，我们在与一些大学教师和曾在高校授过编辑出版专业课的出版社老编辑反复酝酿、协商之后，先确定了18门专业课的选题。其中编辑学方面的教材8本，即《书籍编辑学概论》、《科技书籍编辑学教程》、《期刊编辑学概论》、《中国编辑出版史》、《科技工具书及其使用》、《社科中文工具书使用》、《编辑实用语文》、《编辑应用写作》，基本上是按大学本科的办学层次所必需的专业性课程开列的；出版管理方面的教材10本，即《出版学概论》、《出版社的经营管理》、《出版法概论》、《著作权法概论》、《计算机在出版工作中的应用》、《印刷基础及管理》、《书籍装帧设计教程》、《校对业务教程》、《图书发行教程》、《外国出版概况》，则是从我国目前多数出版单位岗位设置的现实情况出发，按大专办学层次开列的。（其中有的选题是两个专业通用的，个别选题在实施规划过程中也还会有所调整。）总的来看，这些教材大体上是与国家教委高校专业目录中提出的培养目标、业务要求、主要专业课程相吻合的，也是为目前高等学校的教学和各出版单位在职干部的培训以及个人自修提高所迫切需要的。当然，这18本教材的覆盖面尽管已考虑到史、论、技等各门知识学科，但毕竟还不能涵盖全部，以后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和编写力量的加强，还可以陆续补充。

教材质量的提高，有赖于出版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发展以及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编辑出版学科还比较年轻，教材的建设也刚刚起步，因此，这批专业课教材无疑会有缺点和不足，这就需要在试用过程中不断修改和完善。希望广大读者

和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对教材提出补充修改的宝贵意见。相信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不仅会使本套教材在教学实践中成为更新和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新起点，同时在加强出版理论研究和促进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能起到一点投石激浪的作用。

这套教材的出版任务全部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承担，对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我们谨表谢忱！

新闻出版署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

1994年6月28日

绪 论

《校对业务教程》是高等学校编辑、出版专业课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校对的基础知识，认识校对工作的性质和特征，及其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了解校对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过程，学习校对各类图书、各种期刊的基本知识，掌握校对的技术和方法以及校对工作的基本规律。教师不但在课堂上传授理论知识，而且还要十分重视教学中的实践环节，让学生在校对操作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通过循序渐进、有系统的教学活动，学生对校对工作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并具备做一个合格的校对人员的基本能力。

第一节 校对的概念和范围

编辑、出版和发行这三者是出版工作的整体，它是传播、积累思想和科学文化成果的重要手段。校对，是整个出版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要求以质量取胜，既要保证校样上的文字、公式、标点、符号、数据、计量、图表等方面与原稿相符，消灭排版上的一切错误；又要努力发现原稿上的错误、疏漏和不妥之处，及时提交编辑部门解决。校对，是书刊成品前的最后一道质量检验关口，切不可等闲视之。

历史学家经过研究考证，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两种：其一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今伊拉克）的楔形文字，距今约五千多年；其二是埃及的象形文字，距今约四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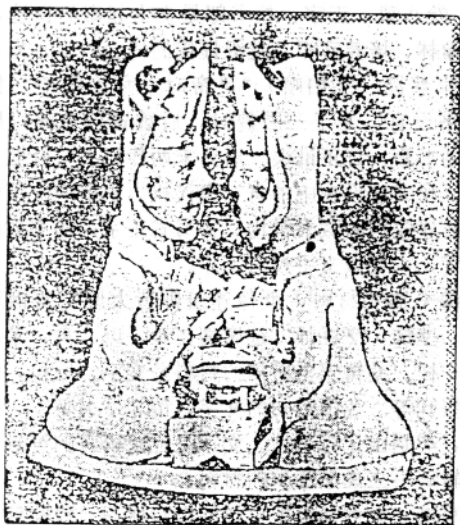
年。文字是语言的表象，校对是跟着文字的产生而来。“校对”一词源于拉丁语，是从 Corrigere 派生出来的，就是“改善”、“改正”的意思。英语中的 read 一词的意思为“阅读”，proof 一词的意思为“校样”，两个词合起来，proofread 即为“校对”，proofreader 引申为校对员。

我国进入有文字的文明时代——大汶口文化，距今约 5000 多年。校对在我国古代称之为“校讎”（亦作“讎校”或“校勘”）。“校”，是考核查对的意思。《汉书·食货志上》：“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骆宾王《帝京篇》：“校文天禄阁。”“讎”，据许慎《说文解字》，其本义为对答。后引申为“讎怨”、“讎敌”的“讎”；再引申为“校讎”的“讎”。这个“讎”字，体内绵延着它的词祖的“敌情观念”；发之于内，怀有“疾恶如仇”的义士心态。这种视书本中的谬误如“逃犯”，如“猎物”，如“冤家仇敌”的校对意识，是我国校对传统中最宝贵、最有特色的内涵。清朝的校勘学家王鸣盛曾经说过，“读书先从校勘始”，“既校始读，亦随校随读”。那就是运用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的方法，在阅读中细心地去发现和改正书上的错别字，寻求著作者的本意。书籍经过校勘，质量就得到显著提高。

除了“校勘”、“校讎”和“校对”外，古代对校对工作的称谓还有“校书”、“校理”和“校讞”。

校书的任务或为作者润色文字，或以其内容考据校核，是一种较高级的校对工作，集编校于一身。这种校对今天称为“校订”。

校理至少要翰林官才能担任，官拜学士。他们的校对工作，多半是鉴定古书的真伪，校勘书籍的错误，整理搜集有关资料，工作范围比今天的校对要广泛得多。



古代人校勘书籍（西晋陶俑）

校缀是将散佚的书籍，予以校对，并且将它连缀起来。《晋书·束皙传》云：“帝以竹书付秘书校缀次第。”秘书或称秘书郎，他做的校缀工作实际上也是校对工作。

校书、校理和校缀，都是书籍付印以前的校对。至于“校对”一词，也并非近代才有，至迟明代已使用得比较普遍。如明代学者沈德符在其所著《获野编·著述》中，就有指责某些人“校对卤莽，讹误转多”的话。那时候，“校对”一词的概念，基本上与“校讎”、“校勘”等相同，而与今天的“校对”有所不同。今天日语中通用的“校正”一词，虽来自我国（见北宋曾巩《梁书目序》），但与我国古代的“校讎”有别，而与我国今天的“校对”相同。

我国古代对校书工作十分重视，对校书者授以官职。据

《唐语林》卷八载，正字、校书郎是文士起家的良选，从这里可产生翰林、培养宰相，越级提拔的机会较多。东汉时的著名文学家蔡邕（字伯喈）“灵帝时，拜为郎中，校书东观”。校书设官，始于三国魏时。后魏置校书郎，属秘书省，掌校勘书籍，订正讹误。唐、宋两代秘书省及弘文馆均置校书郎。秘书省设在中书省（唐代权力中枢的决策机构）之下，是封建政府的藏书机构。秘书省正字是秘书省的一名正九品小官，主要做文字校对工作。

编辑编书需要材料，就像建筑师造大厦需要钢筋、水泥、木材、壁饰，烹饪师办筵席需要鱼、肉、禽、菜以及必要的佐料一样。编辑编书所需的材料是文字、原稿，以及有关的书籍报刊等。我国最初的文字，谓之“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也是作者和编辑著书立说最基本的材料。

作者写书，大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而写。经验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是作者亲身的生活感受，间接经验大多来自于书本的启迪。学术研究尤其要依靠书本。书本如有讹误，就要影响作者的立论。例如，古人把“图”跟“书”分开，“河出图，洛出书”就是明证。《孝经·援神契》说“仓颉视龟而作书”，《吕氏春秋·勿躬篇》说“史皇作图”。可是《淮南子·脩务训》却说“史皇产而能书”，把“图”变成了“书”。后来注家以讹传讹，随文生义，如高诱就在书中写道：“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号曰史皇，或曰颉皇。”把“史皇”和“仓颉”混而为一，这就大谬不然了。其实《淮南子》这个“书”字是错字，应当作“画”（繁体字“書”、“畫”相似）。由于刊本不真，注家不察，才引出了这样的错误。因此，作者在动笔之前，先要把所用之书细细校读，无舛误才摘引或生发。编辑审稿，也必先对各篇文章逐字校阅，核对引文，无错误才

能定稿发排。

由上述可见，治学离不开书本，编辑离不开书本，校对离不开原稿（或原本）。因为书本不真，所治之学或所编所校之书必肤浅误谬。《战国策·赵策四》中有“左师触詟愿见太后”之句，据《史记·赵世家》及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詟”是“龍言”二字之误。如误读为“詟”（zhé），文理虽通，但不符合历史事实。汉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内篇》，经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校勘，校订出文字上的错误共64类900余条。清代胡克家翻刻元刊本《资治通鉴》，经后人把它和宋本对照校订，发现其中正文的漏字、错字、倒字共在万字以上，单漏字一项就有5200多个。道光壬辰刻本《红楼梦》，错字也有两万多个。如果编著者照此引述，必致贻误无穷，传为笑柄。所以说，治学必先治书，治书是治学的基础。于此可见，校对工作是图书出版工作中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和重要环节，根据原稿和原本核对校样，订正差错，以保证出版物的质量；也是读书和科学文化研究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铺路石子。

校对是一个系统工程。古代的校讎家、校书郎，现代的校对人员则是这个系统的主体。校对人员的操作对象，在古代则为原本和它的对照本，在现代则是原稿和校样，或电子计算机屏幕、复印样、蓝样及软片；服务对象是读者；协作对象，在古代为抄书者、雕板者，在现代为排版者、电脑录入人员等。这三者组成了这个系统的客体。

作为校对主体的校对者，也是一个系统。主要是由专职校对者、编辑校对者和著作人（或翻译人）校对者，再加上校对管理者以及非专职的业余校对者诸要素构成。著作人（或翻译人）做校对是“自校”，进一步从宏观上把握主题，校正原稿中的疏漏或失误；编辑做校对是“半自校”，从综观方面对校样进行考查；专职校对人员的校对是“他

校”(视原稿为“他人之物”，没有先入为主之见，较少习焉不察之弊，有利于从原稿中发现问题，提出质疑。不同于校勘学中以他书校本书的“他校”)，从微观上仔细地核对原稿、推敲文字、图表和各种公式、符号。上述三者是图书校对的三个主体，也是完善图书校对质量的互补关系，缺一不可，其中专职校对人员则是校对主体系统中的第一要素。校对管理者是校对主体系统中的“粘合剂”，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其他各校对主体服务，组织他们的协作，协调他们的关系，监督校对质量以及掌握校对进度，对专职校对人员实行质量管理和定额管理，执行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等等。因此，他们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本书的构成，有文字、图像和其他符号。它的内容结构，有篇、章、节、段，正文和各类辅文。校对工作的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者，即从事一定专业的校对，他必须懂得汉字、语法知识和规定的专业知识，如音乐专业、化工专业、物理专业、医学专业等等。广义者，即从事广泛性的校对，包括的专业门类较广，有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的、科技的、音乐的、美术的、考古的等等。这样的校对人员就不光是字对字了，诸如天文地理、山川草木、三教九流、声光化电，都要知晓一点。正如韩愈诗中写的“才子富文华，校讎天禄阁”，即是说要富有才华的才子，才能胜任广泛性图书的校对。当然，这是美誉之言。但一般来说，校对人员不仅要识得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汉字（含简化字、繁体字、异体字），以及各种各样的手写体（含楷书、行书、章草、今草、隶书、篆书、新魏书和不符合规范的生造字、破体字等）；还要粗识世界语种中的一些主要文字（如英、德、法、俄、日、希腊、西班牙文等）；还要求识画、识地图，避免构图或图像中的政治性、常识性、技术性错误；还要求识得诸如音符、图表、公式、化学结构

式、格式、标点以及各种学科的专业符号等等。如果不识得上述这些，光识得汉字，也校不好图书和杂志。

第二节 学习校对的目的

凡有生产产品的地方，就要有“校对”，这是广义而言的校对。“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这一论断，是无数企业家、出版家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的经验之谈。“以质量求生存”，就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种共识。

人们知道，当一项工程结束之后，是否符合工程设计蓝图，各项质量指标是否达到要求，就要有验收单位根据各项指标进行检验，经过严格的检验，合格后，工程才算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在验收过程中，往往会发现很多质量问题，甚至宣布某项工程报废，或要重新返工。工程的检验工作，实际上也就是对某项工程的校对工作。图书是一项综合工程，当然必须进行质量检验，道理是一样的。“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图书在出版过程中，检验质量不仅是专职校对的事，还有著译者、编辑工作者、美术工作者、技术设计工作者、出版工作者以及印刷工作者的校对。因此，从事出版工作的每一环节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掌握一定的校对技能，懂得校对方法。图书的校对工作是一项技术性较强、十分细致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毛泽东同志要求我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又谆谆教导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毛泽东为什么要强调“认真”，这是因为认真不止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态度，而且是对待任何事情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认真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科学的入门。

通过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的校对，培养“精、细、详、

慎”的工作作风。“精、细、详、慎”是孔子的弟子们归纳孔子校书的方法，也就是孔子治学的一贯作风。精，就是精密；细，就是细致；详，就是周到；慎，就是谨慎。做到这四个方面，图书中的文字、符号、图表、格式等才能避免差错。

图书工程又不同于其他工程，它的显著特点是：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说得确切一点，是一种承载精神产品的物质产品，因此图书工程无论从内容到形式，质量上的要求是更为严格和精密。校对工作要对图书工程的内在质量负责，校对的目的在于保证和提高出版物质量，消灭出版物中一切可能发生的错误和缺点，正确地向读者传达著译者的意图；校对的任务就是要将工厂排版后打出的校样与原稿或样本对照，订正上面的倒空、错字、别字、漏字、误排、颠倒以及一切格式上的错误，注意字和名词术语的前后统一；同时，还必须注意原稿或样本中可能存在的疏漏：有表述不确切甚至错误的，有术语使用不当的，有明显笔误的，有引文核错的，有图表不符、张冠李戴的，有公式数字计算错误的，有涉及国家机密的，有国界线标志不明的，有地图上漏去一角或一星半点的，有符号使用混乱的，有文句不合语法规律的，有结构残缺、不合逻辑的等等。所有这些，都应该引起校对人员的重视和及时提请编辑或著译者解决。由于校对人员对文字工作的精细过人，英国文豪狄更斯曾经对校对人员赞扬备至，他说：“从一点最起码的实际经验，我了解了校对者的责任，和如何经常担负着这些责任。我敢说，他们并不是机械化的做一些刻板工作，这一项工作，要求他们表现出他们的本能的智力，高度的修养，好的记忆和明晰的理解力。所有我自己写的书，在付印时，如果没有校对者，不知道要发现多少错误——有些前后不相符，有些是我造成的笔误——总之，这一项工作，并不仅仅是靠眼睛尖锐，还